

目标坚持性和目标灵活性对老年夫妻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

张金凤 汪彦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0044)

摘要:采用目标坚持性/灵活性量表和费城老年中心信心量表对北京的258对老年夫妻进行问卷调查,基于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探讨目标处理策略对老年夫妻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1)夫妻双方的目标处理策略和幸福感分别具有一致性;(2)目标坚持性和灵活性均对自身幸福感有积极效应;(3)丈夫目标坚持性对妻子幸福感有积极效应,但妻子目标坚持性对丈夫幸福感作用不显著;丈夫和妻子的目标灵活性均对配偶幸福感有积极效应;(4)对于丈夫的幸福感,目标灵活性的行动者效应和对象效应均强于目标坚持性;对于妻子的幸福感,目标坚持性和灵活性的行动者效应和对象效应差异均不显著。目标坚持性和目标灵活性对夫妻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

关键词:目标坚持性;目标灵活性;幸福感;老年人;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

分类号:B844

1 问题提出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积极老龄化”发展战略,在健康老龄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老龄群体。幸福感是个人对其生活整体评价的积极程度(Veenhoven & Ruut, 2012),由两方面组成“享乐情感”,即情感体验在一定时期内被愉悦所控制的程度;“满足感”,即个人感受到目标实现的程度(Veenhoven & Ruut, 2012)。幸福感作为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对它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和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实现积极老龄化(李为群, 2017)。已有研究发现,老年人的幸福感对其寿命、死亡率(Koopmans, Geleijnse, Zitman, & Giltay, 2008)、精神生活质量(Tang & Wang, 2009)等都具有重要影响。从幸福感的定义可知,目标实现所带来的满足感是幸福感的重要构成部分,前人研究也对此作了探讨。例如, Klug 和 Maier(2015)通过元分析发现成功的目标追求和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并且目标内容与幸福感指标越匹配,二者的相关性越高。Leach(2008)认为,和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关系的是,为了完成目标所做出的日常努力而不

是目标达到的水平。还有研究指出,除了目标追求,目标脱离和目标再设定也与幸福感显著相关(Wrosch, Scheier, Miller, Schulz, & Carver, 2015)。然而,现有研究多侧重于讨论目标追求过程和目标设置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少关注目标处理策略与幸福感的关系。

目标在人的幸福感中扮演着矛盾的角色:一方面,他们赋予生命以激励的意义,有目标本身就是幸福感的有力预测因子;另一方面,当目标无法实现或超过个人资源,个体却仍然不懈追求时,目标就变成不满足和抑郁的来源(Heckhausen, Wrosch, & Schulz, 2010)。目标处理策略指的是,当想要实现的目标和现实情况存在差距时,个体采取的应对策略(Brandtstädter & Renner, 1990)。根据Brandtstädter和Rothermund(2002)的双重过程框架,人们存在两种目标处理策略——目标坚持性(tenacious goal pursuit, TGP)和目标灵活性(flexible goal adjustment, FGA),这两种目标处理策略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二者途径相反,但都倾向于减少实际情况与预期结果的差距“目标差距”;Brandtstädter & Rothermund, 2002)。目标坚持性,个体通过调整实际环境消除目标差距,通过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704017);重庆市社科基金项目(2017YBSH05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2017CDJSK01XK23)。

通讯作者:张金凤, E-mail: psyzhangjf@cqu.edu.cn

不懈努力改变现状以达成目标; 目标灵活性, 个体通过调整偏好和目标取向消除目标差距, 对目标进行重新评估并将资源引导到新的可行的目标上 (Brandtstädter & Renner, 1990; Brandtstädter & Rothermund, 2002)。不同目标处理策略的运用体现了应对能力的不同方面, 但两种目标处理策略在特定情境下均可带来更高的幸福感 (Brandtstädter & Rothermund, 2002)。目标坚持性使得对目标的追求足够稳定且处于较为封闭的范围内, 以便能专注于目标并抵抗潜在分心因素的影响, 通过对有意义的目标的不懈追求使人拥有更强的自我控制感和自我效能感, 以此提升幸福感 (Bandura, 2000)。当目标坚持性进入“收益递减区”时, 目标灵活性就会占主导地位, 通过对既定情况进行重新评估, 将目标重新调整到可行的范围, 减少目标失控带来的消极情绪, 稳定人们对自身的控制和意识, 提升幸福感 (Brandtstädter & Rothermund, 2002)。

Brandtstädter 和 Rothermund (2002) 所提出的双重过程框架通常被用于研究老年人如何应对老化过程所带来的目标阻碍。老年人的功能下降或丧失日益增加, 朋友的死亡破坏了相互支持的关系, 并造成了孤立和边缘化的问题, 无法控制的消极事件在老年时期不断累积 (Celidoni, Bianco, & Weber, 2017), 但是没有证据显示老年人的主观生活质量, 如幸福感, 有显著性下降 (Jorm, 2000)。对此, 有研究从老年人目标处理策略视角进行分析和解释: 随着年龄增加, 虽然老年人可用于实现目标的资源越来越受限制, 但当理想目标超出现有资源可达到的范围时, 从目标坚持性转向目标灵活性有助于老年人重新获得自我效能感和保持自我价值的完整性。另有追踪研究发现, 高目标灵活性可显著地预测老年人后续的生活满意度水平, 认为当遇到无法实现的目标时, 灵活调整目标的能力是主要资源, 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Gana, Bailly, Hervé, Joulain, & Alaphilippe, 2014)。值得注意的是, 两种目标处理策略同时存在于个体内部, 它们的共同作用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例如, Bailly 等 (2016) 通过对老年人的五年追踪研究发现, 同时具有高目标灵活性和高目标坚持性水平的人的幸福感和更高。另有研究指出目标坚持性水平和目标灵活性水平对于 65 岁以上的老人至关重要, 并认为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倾向于使用更为灵活的目标处理策略 (Brandtstädter & Rothermund, 2002)。Brandtstädter 和 Renner (1990)

通过对 890 个样本进行横断面分析, 发现高目标坚持性和高目标灵活性都能预测高幸福感水平, 同时指出随着年龄的增加, 目标灵活性呈现出明显的增加, 而目标坚持性则表现出相反的回归。因此, 本研究假设, 目标坚持性和目标灵活性均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积极效应, 且目标灵活性比目标坚持性对幸福感的效应更强。

发展不是孤立的, 它往往与其他共同发展的个体交织在一起 (Baltes, Lindenberger, & Staudinger, 2006)。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随着剩余寿命的减少, 老年人会对社会交往进行有选择性的缩减, 更多地会将情感投入到亲密关系上, 比如配偶。夫妻关系具有情感支持、友谊、认知建议等功能, 随着子女长大成人离开原生家庭, 配偶在老年人的生命发展中变得愈加重要 (Arias & Polizzi, 2013)。Hoppmann 和 Gerstorf (2009) 通过对老年人夫妻间相互关系的文献回顾, 提出夫妻相互关联 (spousal interrelations) 的理论框架, 认为配偶可能通过扩大或限制发展性选择, 使得夫妻双方认知、幸福感、健康等方面产生共同的老龄化结果。Monin 等 (2016) 的研究发现虚弱状态和抑郁症状在老年夫妻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老年夫妻的虚弱状态和抑郁症状变化趋势相同。因此, 本研究假设目标处理策略在老年夫妻之间具有一致性, 幸福感在老年夫妻之间具有一致性。

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 Cook & Kenny, 2005) 被广泛应用于分析成对数据之间的相互影响。在 APIM 中, “行动者效应”被定义为个体的自变量对自身因变量的影响, 即个体内效应; “对象效应”被定义为个体的自变量对成对关系中另一半的因变量的影响, 即个体间效应 (Kenny, Kashy, Cook, & Simpson, 2006)。在本研究中, 行动者效应是指个体的目标处理策略对自身幸福感的影响; 对象效应是指个体的目标处理策略对配偶幸福感的影响。Hoppmann 和 Gerstorf (2009) 对老年配偶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评估, 发现老年个体在认知、健康、幸福感等方面影响配偶并受到配偶的影响。一项关于澳大利亚纵向老龄化的研究探究了认知功能在已婚夫妇中发挥的动态作用, 认为社会关系伙伴如配偶对晚年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老年人的基本认知过程变化受到了配偶的影响 (Gerstorf, Hoppmann, Anstey, & Luszcz, 2009)。Walker 和 Luszcz (2009) 通过研究晚年婚姻关系对幸福感的影响, 发现配偶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一项对西雅图 178 对夫妻的 35

年纵向研究发现,个体的幸福感水平和变化轨迹均与配偶密切相关(Hoppmann, Gerstorf, Willis, & Schaie, 2011)。夫妻作为一个整体,在共同应对目标时可能会相互影响,比如目标坚持性水平高的人,可以在配偶想要放弃目标时激励配偶坚持不懈,帮助配偶达成目标,提升配偶幸福感;目标灵活性水平高的人,也可以在配偶目标不能实现的时候帮助配偶进行重新评估与目标调整,减少消极情绪,保持配偶幸福感。因此,本研究假设老年人的目标处理策略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幸福感,还会对配偶的幸福感产生影响。

本研究基于 APIM,以老年夫妻为研究对象,探

讨目标处理策略对幸福感的影响。本研究假设(图 1):

(1) 丈夫和妻子的目标处理策略具有一致性,丈夫和妻子的幸福感具有一致性;

(2) 目标处理策略对幸福感有显著的行动者效应,即老年人的目标坚持性水平/目标灵活性水平会显著提高自身的幸福感水平;

(3) 目标处理策略对幸福感有显著的对象效应,即老年人的目标坚持性水平/目标灵活性水平会显著提高配偶的幸福感水平;

(4) 相比于目标坚持性,目标灵活性对幸福感的行动者效应和对象效应更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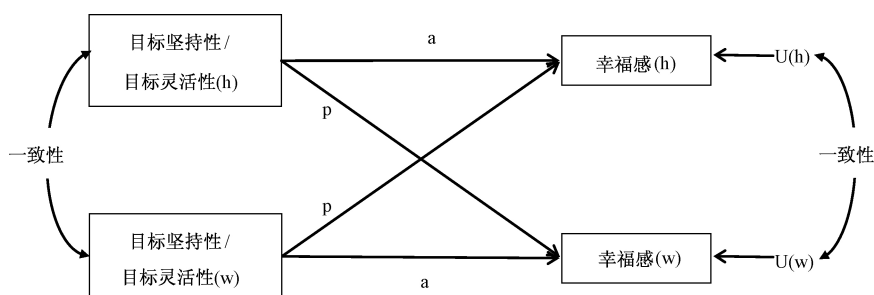


图 1 目标坚持性/目标灵活性和幸福感的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

(注: h 表示丈夫; w 表示妻子; a 表示行动者效应; p 表示对象效应。)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对来自北京 22 个社区的 258 对夫妻(年龄 60~97 岁)进行问卷调查。其中,男性被试平均年龄为 69.14 ± 7.40 ,女性被试平均年龄为 67.16 ± 6.44 。男性被试受教育程度在初等教育及以下的占 20.5%、中等教育的占 55.8%、高等教育的占 23.7%;女性被试受教育程度在初等教育及以下的占 30.2%、中等教育的占 53.1%、高等教育的占 16.7%。夫妻家庭月收入在 3000 元以下的占 17.5%,在 3001~5000 元的占 36.0%,在 5001~8000 元的占 31.8%,在 8000 元以上的占 14.7%。

2.2 工具

2.2.1 目标处理策略

采用 Brandtstädter 和 Renner(1990)编制的 TGP 和 FGA 量表,该量表的中文版来自于 Zhang, Yu, Zhang 和 Zhou(2018)的研究。TGP 和 FGA 量表各包含 15 个项目,五点计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

“5”(非常同意)。TGP 量表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目标坚持性水平越高,FGA 量表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目标灵活性水平越高。本研究首先选择男性样本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因子抽取方法选择主成分,旋转方法选择 Promax),结果显示:两个因子 TGP 和 FGA 各有 5 个题目的因子负荷小于 0.30。删掉因子负荷小于 0.30 的题目,TGP 和 FGA 各保留 10 个题目,总共能解释 35.46% 的变异(TGP: 14.19%; FGA: 21.27%)。然后在女性样本中做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拟合良好 [$\chi^2(101) = 149.49$, RMSEA = 0.04, CFI = 0.95, TLI = 0.94, SRMR = 0.04]。对女性样本做探索性因素分析,对男性样本做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类似结果(模型拟合指数 $\chi^2(df=101) = 164.55$, RMSEA = 0.05, CFI = 0.94, TLI = 0.93, SRMR = 0.05)。删减之后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TGP: $\alpha_h = 0.77$, $\alpha_w = 0.72$; FGA: $\alpha_h = 0.80$, $\alpha_w = 0.73$ ^①)。

2.2.2 幸福感

采用费城老年中心信心量表(Philadelphia Geriatric Center Morale Scale)中文修订版(范肖冬,

① α_h 和 α_w 分别代表男性和女性在本研究中的量表信度,下同。

1999)。原始量表由 Lawton(1975) 开发, 包含 23 道题, 由 Liang 和 Bollen(1983) 修订为 15 题, 测量老年人的焦躁(6 题)、对老化的态度(5 题)、生活不满(4 题) 三个方面。采用五点计分, 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计算 15 个项目的总分, 总分越高, 老年人的幸福感越高。以往研究显示该量表的中文修订版在中国老年人身上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属性(Zhang & Zhang, 2015; 范肖冬, 1999)。本研究中量表的信度为: $\alpha_h = 0.88, \alpha_w = 0.88$ 。

2.3 施测程序

研究者在社区招募被试, 要求年龄 60 岁以上, 老年夫妻共同参加问卷调查。数据收集由接受过心理学问卷调查统一培训的研究生完成。大部分老年人自行作答问卷, 少数老年人由于文化程度低或视力障碍等则通过一对一的访谈完成问卷调查。丈夫和妻子分开独立作答问卷, 一对老年夫妻共获得 30 元报酬。问卷调查约 30 分钟, 在社区的老年活动室完成。

2.4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21.0 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双变量相关分析。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使用软件 Mplus7.0 进行分析, 并运用参数限制 Wald 检验方法(Wald Test of Parameter Constraints) 考察目标坚持性和目标灵活性对幸福感的效应差异。老年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和身体健康状态为控制变量。 $p < 0.05$ 为显著性标准。

3 结果

3.1 目标坚持性、目标灵活性与幸福感的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分析表明: (1) 目标坚持性($r = 0.35, p < 0.01$)、目标灵活性($r = 0.47, p < 0.01$) 和幸福感($r = 0.56, p < 0.01$) 在夫妻之间分别呈显著正相关; (2) 幸福感与自身的目标坚持性、目标灵活性两个因子呈显著正相关($r = 0.35 \sim 0.57, p < 0.01$); (3) 幸福感与配偶的目标坚持性、配偶目标灵活性两个因子呈显著正相关($r = 0.19 \sim 0.44, p < 0.01$)。

表 1 目标坚持性、目标灵活性与幸福感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n = 258$)

	$M \pm SD$	1	2	3	4	5	6
1. 目标坚持性(h)	26.25 \pm 4.81	—					
2. 目标坚持性(w)	26.02 \pm 4.33	0.35**	—				
3. 目标灵活性(h)	27.40 \pm 4.83	0.32**	0.12	—			
4. 目标灵活性(w)	27.48 \pm 4.37	0.16*	0.33**	0.47**	—		
5. 幸福感(h)	53.34 \pm 9.86	0.35**	0.19**	0.57**	0.44**	—	
6. 幸福感(w)	52.46 \pm 10.02	0.36**	0.41**	0.39**	0.52**	0.56**	—

注: h = 丈夫; w = 妻子; * $p < 0.05$; ** $p < 0.01$, 下同。

3.2 夫妻目标坚持性与目标灵活性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

基于 APIM, 以丈夫和妻子的目标坚持性、目标灵活性作为预测变量, 丈夫和妻子的幸福感作为结果变量构建模型。结果表明: (1) 丈夫与妻子的目标坚持性($a^h = 0.14, a^w = 0.25, p < 0.01$)、目标灵活性($a^h = 0.44, a^w = 0.36, p < 0.01$) 对自身幸福感的影响均显著; (2) 丈夫的目标坚持性对妻子的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p^w = 0.16, p < 0.01$), 但妻子的目标坚持性对丈夫的幸福感无显著预测作用($p > 0.05$); (3) 夫妻的目标灵活性对配偶的幸福感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p^w = 0.17, p^h = 0.19, p < 0.01$)。模型拟合指数 $\chi^2_{(df=56)} = 98.08, RMSEA = 0.05, CFI = 0.96, TLI = 0.94, SRMR = 0.04$ 。

3.3 夫妻目标坚持性与目标灵活性的效应差异

由表 2 和图 2 结果可知: (1) 在丈夫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 丈夫自身目标坚持性的影响强度显著低于自身目标灵活性的影响强度($a^h = 0.14, a^h = 0.44, Wald Test = 9.74, p < 0.01$); 妻子目标坚持性的影响强度也显著低于妻子目标灵活性的影响强度(考虑到图 2 妻子目标坚持性对丈夫幸福感的回归系数 $p^h = 0.01$ 不显著, 而妻子目标灵活性对丈夫幸福感的回归系数 $p^h = 0.19$ 显著, 且表 2 两者的系数差异 $Wald Test = 3.56, p = 0.06$ 在 $p < 0.10$ 水平显著); (2) 在妻子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中, 妻子自身目标坚持性的影响强度与自身目标灵活性的影响强度无显著差异($p > 0.05$); 丈夫目标坚持性的影响强度与丈夫目标灵活性的影响强度也无显著差异($p > 0.05$)。

表 2 目标坚持性与目标灵活性对幸福感的效应差异检验

	幸福感 h			幸福感 w		
	β	SE	Wald Test (df = 1)	β	SE	Wald Test (df = 1)
目标坚持性 h	0.14	0.06	9.74**	0.16	0.05	0.01
目标灵活性 h	0.44	0.06		0.17	0.06	
目标坚持性 w	0.01	0.06	3.56 ⁺	0.25	0.07	1.18
目标灵活性 w	0.19	0.06		0.36	0.08	

注: β = 标准化回归系数; SE = 标准误; ** $p < 0.01$, ⁺ $p < 0.1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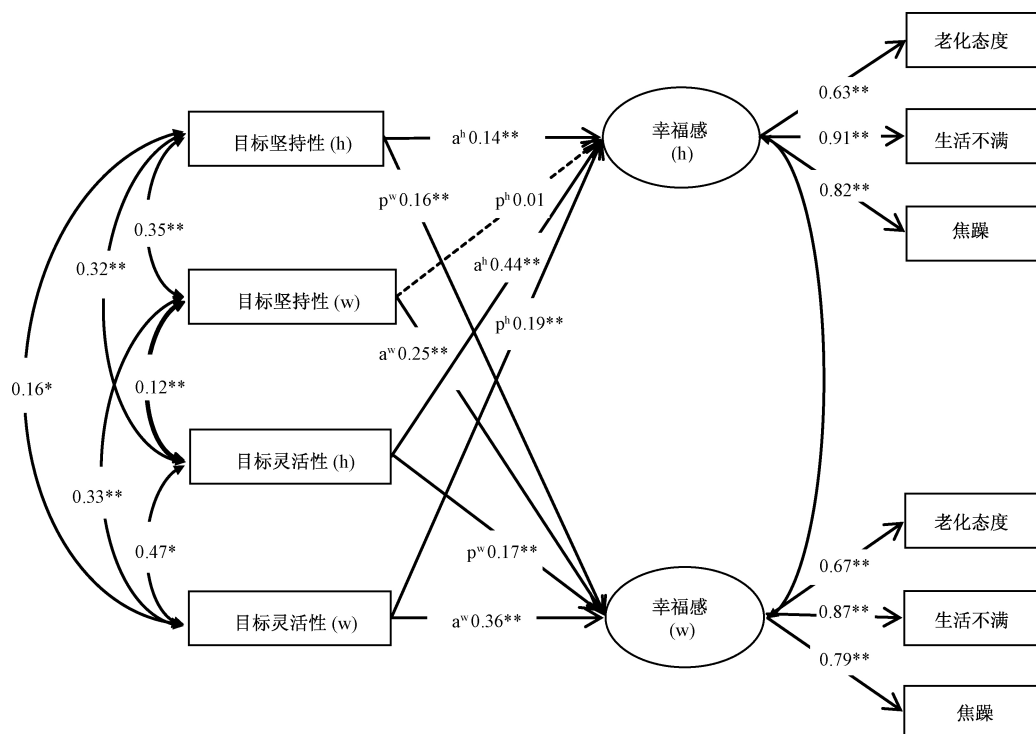


图 2 夫妻目标坚持性/目标灵活性对幸福感的预测作用

(注: a^h 表示丈夫的行动者效应, a^w 表示妻子的行动者效应, p^h 表示妻子对丈夫的对象效应, p^w 表示丈夫对妻子的对象效应; 图中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数据模型纳入了控制变量, 但未呈现在图中。)

4 讨论

本研究从夫妻的视角, 探讨老年人的目标处理策略对自身及配偶幸福感的影响, 所得结果基本证实了本研究的假设。目标处理策略和幸福感在老年夫妻之间具有一致性, 验证了假设一。目标处理策略不仅影响自身而且影响配偶的幸福感。然而, 夫妻之间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丈夫和妻子的目标灵活性水平对配偶的幸福感水平影响显著; 丈夫的目标坚持性水平能够显著影响妻子的幸福感水平, 但妻子的目标坚持性水平对丈夫幸福感水平的效应不显著。因此, 验证了假设二和部分验证了假设三。目标坚持性和目标灵活性的效应强度具有差异, 且

这种差异在夫妻之间存在不同, 部分验证了假设四: 对于丈夫的幸福感, 目标灵活性的行动者效应和对象效应均强于目标坚持性; 对于妻子的幸福感, 目标坚持性和目标灵活性的行动者效应和对象效应差异不显著。

本研究发现目标坚持性、目标灵活性和幸福感在老年夫妻内部均具有一致性。该结果表明丈夫与妻子的数据存在非独立性, 支持了夫妻相互关联的理论框架 (Hoppmann & Gerstorf, 2009)。该结果也说明本研究采用 APIM 相较于假设数据独立的传统统计方法更加合理, 以夫妻成对数据作为分析单位能有效避免因数据变量相关性造成的结果误差。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Monin et al., 2016; Walker &

Luszcz, 2009), 本研究结果表明老年夫妻之间的幸福感存在相互传染效应。本研究还发现, 夫妻双方的目标处理策略会相互影响, 未来可考虑以夫妻为单位设计目标处理策略的干预方案。

研究发现目标坚持性和目标灵活性对个体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这与本研究提出的行动者效应假设一致, 也与西方的研究结果一致(Bailey et al., 2016; Brandtstädter & Renner, 1990)。本研究结果支持了 Brandtstädter 和 Rothermund(2002) 在双重过程框架中提出的目标坚持性与目标灵活性通过相互作用带来高幸福感水平的观点。目标坚持性使得老年人通过不断获取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来扩大行动资源克服障碍, 当其对实现目标的前景感到乐观时, 可能会更加坚定努力和坚持不懈。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的自我信念、自我控制和自我效能感不断提升, 使得老年人相信自己老当益壮, 最终幸福感也得到提高。目标灵活性有助于老年人及时将个人偏好重新调整到可行的范围, 通过这种更易达成的方式提高对目标及生活的控制感, 同时通过及时放弃或改变由于老化而难以实现的目标, 减少消极情绪的影响, 由此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

研究还发现丈夫和目标妻子的目标灵活性水平对配偶的幸福感产生了显著影响, 支持了本研究提出的对象效应假设。本研究强调将夫妻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夫妻的目标灵活性水平越高, 对既定情况进行重新评估并进行资源有效引导的水平也越高, 整个家庭的处理风格越倾向于开放和灵活, 因目标超出行动资源而无法实现所导致的消极情绪就越少, 因此目标灵活性能够提升家庭成员即配偶的幸福感。本研究发现目标坚持性的对象效应存在性别差异, 即丈夫的目标坚持性水平对妻子的幸福感具有显著作用, 但妻子的目标坚持性水平不能显著预测丈夫的幸福感。造成这种性别不对称的原因可能是: 在中国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中, 相比于女性, 男性更具权威性, 男性的行为特征对家庭成员的影响更大(Hiew, Halford, Vijver, & Liu, 2015), 因此丈夫对目标的顽强追求能够影响到配偶的幸福感。但是, 自我效能感作为目标坚持的基础和动机之源, 妻子的目标坚持性水平高, 自我效能感强, 对丈夫的自我效能感可能会产生抑制作用。而男性的自我效能感对自尊的影响显著高于女性, 个体自尊与幸福感之间又存在较高水平的正相关关系(Brandtstädter & Rothermund, 2002; 高媛媛, 江宜霖, 黄希庭, 2014)。因此, 妻子目标坚持性水平较高, 可能会削弱丈夫的

自我效能感和自尊, 从而对丈夫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目标坚持性和目标灵活性对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差异显示, 相较于目标坚持性, 目标灵活性与丈夫幸福感的相关性更高; 但是二者与妻子幸福感的相关性没有显著差异。究其原因, 首先, 中国的传统文化倡导“男主外而女主内”, 随着退休, 男性从社会退出进入到家庭, 社会角色转变较大, 这要求男性老年人及时放弃曾经珍惜但不再适宜的目标, 调整资源以维持其他可行目标, 因此男性老年人需要有更高水平的目标灵活性。但女性在退休后仍以家庭事务为重, 其目标并未发生较大改变, 因此顽强追求目标和灵活调节目标的重要性差异不明显。其次, 相比于女性老年人, 男性老年人在退休后生活范围缩小, 孤独感和无助感更多, 面临的消极情绪更多, 表现出更低的心理健康水平(唐丹, 陈章明, 2011), 因此男性老年人更需要通过调适过程来降低消极情绪, 提高幸福感。而女性在退休后, 容易从家务劳动或照看后代等事务中重新获得心理平衡, 消极情绪较少, 因此对目标灵活性未提出更高的要求。最后, 社会对男性的期望认为男性在家庭中应是顶梁柱的角色, 在夫妻的共同生活中, 男性应更主动地承担义务和责任。在老年人身体机能普遍退化, 获取资源和知识的能力普遍下降的情况下, 为维持夫妻良好的生活质量, 男性在灵活调整生活目标与灵活运用资源的过程中应处于主导地位, 这也对男性的目标灵活性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男性老年人更需要关注自身目标处理策略的转变, 逐渐从以目标追求过程为主导转为以调适过程为主导, 同时注重目标灵活性水平的提升。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 首先, 样本来自于北京地区的老年夫妻, 可能无法代表中国其他省市以及国外的情况; 其次, 本研究虽然考察了目标处理策略对幸福感的行动者效应和对象效应, 但并未考察其中的作用机制, 未来研究可以加入中介变量(如自我控制感、自我效能感等)进一步探讨; 最后, 本研究采用的横断面数据, 不能推导因果关系, 后续可采用追踪研究或实验研究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结果。

5 结论

(1) 老年夫妻的目标坚持性和目标灵活性均可提高自身的幸福感水平;

(2) 丈夫的目标坚持性对妻子的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 但妻子的目标坚持性对丈夫的幸福感影响

不显著;丈夫和妻子的目标灵活性均对配偶的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3) 对于男性老年人,相较于目标坚持性,目标灵活性更为重要;对于女性老年人,二者的重要性没有显著差异。

参考文献:

- Arias, C. J., & Polizzi, L. (2013). The couple relationship—support functions and sexuality in old age. *Journal Kairós Gerontologia*, 16(1), 27–48.
- Bailly, N., Martinent, G., Ferrand, C., Gana, K., Joulain, M., & Maintier, C. (2016). Tenacious goal pursuit and flexible goal adjustment in older people over 5 years: A latent profile transition analysis. *Age and Ageing*, 45(2), 287–292.
- Baltes, P. B., Lindenberger, U., & Staudinger, U. M. (2006). Life span theory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In R. M. Lerner & W. Damon (Eds.),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pp. 569–664). Hoboken: Wiley.
- Bandura, A. (2000). Self-efficacy: The foundation of agency. In W. J. Perrig & A. Grob (Eds.), *Control of Human Behavior, Mental Processes, and Consciousness* (pp. 17–34). Mahwah, NJ: Erlbaum.
- Brandtstädter, J., & Renner, G. (1990). Tenacious goal pursuit and flexible goal adjustment: Explication and age-related analysis of assimilative and accommodative strategies of coping. *Psychology and Aging*, 5(1), 58–67.
- Brandtstädter, J., & Rothermund, K. (2002). The life-course dynamics of goal pursuit and goal adjustment: A two-process framework. *Developmental Review*, 22(1), 117–150.
- Celidoni, M., Bianco, C. D., & Weber, G. (2017). Early retirement and cognitive decline.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using SHARE data.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56, 113–125.
- Cook, W. L., & Kenny, D. A. (2005).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 model of bidirectional effects in development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29(2), 101–109.
- Gana, K., Bailly, N., Hervé, C., Joulain, M., & Alaphilippe, D. (2014). Does flexible goal adjustment predict life satisfaction in older adults? A six-year longitudinal study. *Ageing and Mental Health*, 18(5), 662–670.
- Gerstorf, D., Hoppmann, C. A., Anstey, K. J., & Luszcz, M. A. (2009). Dynamic links of cognitive functioning among married couples: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the Australian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 *Psychology and Aging*, 24(2), 296–309.
- Heckhausen, J., Wrosch, C., & Schulz, R. (2010). A motivational theory of life-span develop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117(1), 32–60.
- Hiew, D. N., Halford, W. K., Vijve, J. R., & Liu, S. (2015). Communication and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in Chinese, western, and intercultural Chinese-western coupl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0(2), 193–202.
- Hoppmann, C. A., & Gerstorf, D. (2009). Spousal interrelations in old age—A mini-review. *Gerontology*, 55(4), 449–459.
- Hoppmann, C. A., Gerstorf, D., Willis, S. L., & Schaie, K. W. (2011). Spousal interrelations in happiness in the Seattle longitudinal study: Considerable similarities in levels and change over time. *Development Psychology*, 47(1), 1–8.
- Jorm, A. F. (2000). Does old age reduce the risk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 review of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across the adult life spa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30(1), 11–22.
- Kenny, D. A., Kashy, D. A., Cook, W., & Simpson, J. (2006). *Dyadic data analysi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Klug, H. J. P., & Maier, G. W. (2015). Linking goal progres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6(1), 37–65.
- Koopmans, T. A., Geleijnse, J. M., Zitman, F. G., & Giltay, E. J. (2008). Effects of happiness on all-cause mortality during 15 years of follow-up: The Arnhem elderly stud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1(1), 113–124.
- Lawton, M. P. (1975). The Philadelphia Geriatric Center Morale Scale: A revision. *Journal of Gerontology*, 30(1), 85–89.
- Leach, D. M. (2008). *The effects of personal goals on well-being* (M. A. Thesis).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n Marcos.
- Liang, J., & Bollen, K. A. (1983). The structure of the Philadelphia Geriatric Center Morale Scale: A re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Gerontology*, 38(2), 181–189.
- Monin, J., Doyle, M., Levy, B., Schulz, R., Fried, T., & Kershaw, T. (2016). Spousal associations between frailty status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Longitudinal findings from the cardiovascular health stud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64(4), 824–830.
- Tang, D., & Wang, D. (2009). Reason or result?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the elderly in urban Beijing: A cross-lagged panel regression analysis. *Ageing International*, 34(4), 189–202.
- Veenhoven, & Ruut. (2012). Evidence based pursuit of happiness: What should we know, do we know and can we get to know? *Munich Personal Repec Archive Paper*, 41924. Retrieved June, 2012, from <https://ideas.repec.org/p/pramprapa/41924.html>.
- Walker, R. B., & Luszcz, M. A. (2009). The health and relationship dynamics of late-life coupl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geing and Society*, 29(3), 455–480.
- Wrosch, C., Scheier, M. F., Miller, G. E., Schulz, R., & Carver, C. S. (2015). Adaptive self-regulation of unattainable goals: Goal disengagement, goal reengagemen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9(12), 1494–1508.
- Zhang, J. F., Yu, N. X., Zhang, J. X., & Zhou, M. J. (2018). Age stereotypes, flexible goal adjustment, and well-being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Psychology, Health and Medicine*, 23(2), 210–215.
- Zhang, Z., & Zhang, J. X. (2015).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retirees in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3, 143–160.
- Lawton, M. P. (1975). The Philadelphia Geriatric Center Morale Scale: Are vision. *Journal of Gerontology*, 30(1), 85–89.

范肖冬. (1999). 费城老年中心信心量表. 见: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主编.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80-81.

高媛媛, 江宜霖, 黄希庭. (2014). 居民一般自我效能感对幸福感的影响: 自尊的中介作用. *心理研究*, 7(2), 62-67.

李为群. (2017). 社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结构方程模型的研究——以长春市朝阳区为例(博士学位论文). 吉林大学长春.

唐丹, 陈章明. (2011). 相同生活背景下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及年龄相关变化. *中国老年学杂志*, 1(31), 118-121.

The Effects of Tenacious Goal Pursuit and Flexible Goal Adjustment on Well-being among Elderly Couples: Based on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ZHANG Jinfeng WANG Ya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Abstract: This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actor and partner effects of go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on well-being among elderly couples. A total of 258 elderly couples in Beijing completed measures of tenacious goal pursuit, flexible goal adjustment, and well-being.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dyad had significant congruence in tenacious goal pursuit, flexible goal adjustment, and well-being, respectively; (2) tenacious goal pursuit and flexible goal adjustment had significant actor effects on well-being within the dyad; (3) husband's tenacious goal pursuit had a significant partner effect on wife's well-being, while wife's tenacious goal pursuit did not show a significant partner effect on husband's well-being; flexible goal adjustment had significant partner effects on well-being within the dyad; (4) for husband's well-being, the actor and partner effects of flexible goal adjustment were stronger than that of tenacious goal pursuit, whereas for wife's well-being, the actor and partner effects of the two go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enacious goal pursuit and flexible goal adjustment played different roles in elderly couples' well-being.

Key words: tenacious goal pursuit; flexible goal adjustment; well-being; older adults;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